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4

1986

近代史研究

4

(双月刊)

总第34期 7月出版

孙中山和中国的近代化	金冲及 (1)
* * *	*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	茅海建 (14)
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	贺跃夫 (31)
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	
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	樊明方 (55)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	
政策的发生和发展	刘德喜 (72)
中央红军入黔时西南军阀	
与蒋介石的勾结和矛盾	李双璧 (87)
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	徐 焰 (102)
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	潘 荣 (121)
	肖 前
* * *	*
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	胡绳武 (136)
	程为坤
* * *	*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	黄逸平 (163)
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	胡光明 (182)
抗战前无锡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与意义	陆仰渊 (224)
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	严学熙 (240)
欧战后苏州丝织手工业三十年间的蜕变	段本洛 (259)
晋绥边区工商税政策的演变	韩志宇 (277)

问 题
讨 论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在
全党占统治地位

胡庆云(290)

读 史
札 记

烟台仁德洋行点滴

宋玉斌(310)

书 讯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已出版

(317)

孙中山和中国的近代化*

金 冲 及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换年代：古老的中世纪的中国正在死去，新生的近代化的中国将要诞生。在这个充满着新和旧的复杂冲突的岁月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一个战士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同旧势力奋战；以一个开拓者那种生气勃勃的创业精神，在人们面前勾划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化的蓝图，并为它的实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为了中国的近代化，孙先生的一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一

孙中山政治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他的童年是在广东沿海一个农民家庭里渡过的。这种生活使他和同时许多中国先进分子有很大不同，较少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十二岁那年，他靠着已成为华侨资本家的哥哥的帮助，来到了夏威夷群岛。以后，在檀香山，在香港，长时期接受了西方的近代教育，成为最早取得从事外科和产科医师证书的中国人。多年的海外实际生活，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较。当重新接触中国的社会生活时，他对周围那种沉睡着的中世纪式的专制、愚昧和落后，格外感到难以忍受。

-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聘请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

孙中山一九二三年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到：他在香港读书期间“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我因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孙中山这时强烈地渴望把古老而衰败的旧中国改造成成为西方那样的近代文明国家。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表达的也是这种期望。他写道：“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说：“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

但在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时，孙中山很快发现：这时的中国毕竟已不同于当年的欧洲。这里有两个不同：国情不同，时代也不同。由于这两个不同，中国的近代化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国家走过的那条现成的道路，而要另行走出一条适合于自己情况的路子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不同：国情不同。

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和当年欧洲各国是一些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成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两个最巨大的障碍物。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沉痛地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孙中山曾想绕开这两个障碍物。他在家乡从事

过一些地方自治的尝试，结果没有行得通。他上书李鸿章，提出过温和的改造中国的建议，留下的也只有冰冷的回忆。事实教训了他：不实现民族独立，不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中国的近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尽管他在初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为出发点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产生了他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学说，并驱使他走上以武装起义为主要手段的革命道路。这在孙中山的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飞跃。我们不能责怪孙中山为什么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为什么在早年还作过这样那样改良的尝试；倒是应该赞叹在这样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探索领域里，他竟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从事实中得出结论，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断然决然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跨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头。这确实表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宏伟气概和胆略。

在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飞跃后，孙中山没有就此停步。他曾一再说过这种意思：“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它。”他力图把眼光放得更远。他要研究世界历史正在沿着什么方向前进，他要研究欧美各国最新的社会潮流和思想潮流，力图为中国未来作出最佳的选择。这便遇到了第二个不同：时代的不同。

当中国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时，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悬殊，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正在迅速兴起。时代的这种新的变动，立刻在十分敏感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产生了反响。

他在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远游欧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居留了很长时间，从事实地考察，并广泛阅读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书籍。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

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

我们尽可以指出孙中山这时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也可以指出他接受亨利乔治影响而提出的“平均地权”其实只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客观上恰恰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一个重要事实毕竟是不容忽视的：他在醉心学习西方的同时，已开始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不再把西方世界看作完美无缺的极乐世界，而开始对它抱有批判的态度，并注意到社会革命的问题。这在孙中山的思想上，又是一个新的重大的飞跃。在中国，过去还没有人如此鲜明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因而，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孙中山把他提倡的“民生主义”看作就是社会主义。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他在复友人函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这是我们见到的孙中山最早提到社会主义的地方。一九〇五年五月，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走访了第二国际执行局，请求接受他的党为第二国际的成员。他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想“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里尽管包含着不少空想，但孙中山主观上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同情表达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就这样地形成了。

三民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的。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内部已出现危机、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中日益强烈地形成的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这些

客观的历史要求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民族”“民权”和“民生”这三大主义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来并发展起来。

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他一再强调：“要解决民族问题，同时不能不解决民权的问题；要解决民权问题，同时不能不解决民生问题。”这种认识一旦被众多的人们所承认，它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帮助人们懂得中国的近代化是不能同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这些根本要求相分离的，并且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为它扫清道路。否则，即便把“近代化”唤上千万遍，仍然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些认识从这时起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

二

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形成前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实际革命活动。这是完全做得对的，因为这时的清朝政府顽固地镇压一切爱国行动，拒绝任何根本改革。不扫除这个障碍，中国近代化是谈不上的。这确是抓住了整个链条中的中心环节。

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腐败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结束，新的民主共和国成立起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坚持在《临时约法》中写上：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他认为：现在国体既已改为共和，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不出二十年必可成为一个至强极盛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熬过了漫漫长夜之后，终于迎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

孙中山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他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努力的，即在此事。”（《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怎样理解孙中山这段话呢？简单的指责并不足以服人。孙中山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的近代化。他的本意是说：政治上的主

要障碍既已扫除，现在就有可能把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工业化和社会进步问题提到主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他在另一处说：“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把清朝政府的推翻看作“破坏之局已终”，以为今后可以全力从事近代化建设了，这自然并不符合实际，但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逻辑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还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是在给宋教仁的信中说的。他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治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因为是给亲密友人的私人信件，话说得比公开言论更清楚更透彻了。孙中山并没有天真到以为政治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他认为，在清朝政府被推翻后遗留的政治问题有如一团乱麻，谁一时都难以措手足，如果一味从这里下手，反会越搞越乱，倒不如暂时把政治问题搁置一下，先集中全力把经济发展起来，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头再来解决政治问题就好办了。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这个看法是不全正确的，因为他对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估计得太不足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以后很快就被事实所证明了。但从当时来说，袁世凯的面目需要有一个暴露的过程，许多人还认识不清，其中也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所以他这个事后看来是不正确的战略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段时间内，孙中山确是满腔热忱地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奔走呼号，他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发表的言论比政治问题要多得多。在他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初的种种主张中，有几点很可以注意：

第一，他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首要问题。主张在广泛采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中国的面貌。他这样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

第二，发展社会生产力应该从何着手？他认为应从交通事业着手。他说：“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在北京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他尤其注重铁路的建设，自告奋勇愿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要在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他对实现这个计划十分乐观，说：“我国地大物博，若能于最速之时间内造成二十万里之铁路，何患不为地球第一等国。”（《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第三，他认为发展实业应该依靠国家的力量。特别是铁路、矿山、大企业，一定要由国家来经营，不能为私人所垄断。他认为：“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第四，为了尽快地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他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他看到中国的经济建设面对着资金、技术、管理三方面的困难，提出：“款既筹不出，时又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的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他举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很快地发展起来，“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中国应该“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他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认为：

只要借债的条件无损于主权，借债又有何妨？他的这些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确也包含了不少合理的想像。在近代中国，一个爱国者既要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又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要敢于面向世界，善于汲取国外的长处，迎头赶上，这样才能实现中国近代化。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远大眼光和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第五，孙中山始终把工业化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考虑。他既醉心于把中国改造成近代化的工业国家，又期望能预先采取措施，防止贫富悬殊的出现，以免日后再发生社会革命。他的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宣布土地公有，规定地价，征收地价税；另一条就是前面所说，由国家来经营铁路、矿山、大企业，收入归国家所有。以为：“国家有铁路、矿山、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孙中山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且不多说这些想法有着很大的空想性，即便照它实行起来，只要国家政权没有转移到劳动人民手中，仍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孙中山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存在。

还应该提到：孙中山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又很重视精神建设。他在济南的一次演讲中说：“然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以后，他在《孙文学说》中更明确地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他所说的“心性文明”，指的就是精神文明。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建设是缺一不可的。自然，孙中山对它的理解和我们今天不尽相同。但他那么早就能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弥足珍贵的。

孙中山在一段时间内，对他这些想法的实现抱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还掌握在大买办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等人的手中，广大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关系还未丝毫动摇，不实行根本的政治变革，单纯从经济问题下手，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想实行近代化，是多么艰难！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撕破了孙中山的梦想。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只是一个信号。孙中山比许多人更快地惊醒过来。他和他的同志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投入了反袁斗争。

三

在这以后，便是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孙中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奋斗。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他一时仍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能同民众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斗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中国的革命仿佛已走入了绝境。

但就在这样坎坷的处境中，孙中山仍然深信中国终将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并为此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他写了《实业计划》一书。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后。孙中山看到西方国家有大量工业设备在战后闲置无用，急于向外寻求投资出路，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乘此大量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就能获得最有利的投资条件，全面地开展经济建设。他希望：“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孙中山后来说过：“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象开辟市

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产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之公家。”（《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在他的计划中，首先注重的是铁路、道路的建筑，运河、水道的修治，商港、市街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这些“交通运输屯集”的基础设施搞好了，中国实业的发展才有可靠的保障。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对农业、采矿业、钢铁业、机器业等的发展，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并说：“农矿二业，实为其它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也。”

“炭、油、电者，实业之用也。”“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书中还写道：“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这些设想在当时都无法实现。建设事业本身的发展，也远比孙先生所设想的更为复杂而艰难，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一蹴而就的。他对这方面的困难往往估计得较少。但孙中山在逆境中对中国近代化理想的这种执着的追求，是很令人感动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不能不痛苦地深思：那样美好的设想为什么不能实现？导致他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他终于猛醒过来，得到一个新的认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建立起近代化的高楼大厦，第一步必须对盘踞在这块国土上的根深蒂固的旧势力进行彻底的扫荡。

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也就是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在上海青年会作了一次讲演，题目就叫《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他首先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有代表性的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是立国的要素”；第二种认为应当首先“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计之困厄”；第三种认为“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一事”。他指出，在黑暗政治的摧残下，这些都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从而得出结论：“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

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这地底的陈土是什么？孙中山在这次讲演中指出的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几年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的认识又跨进了一大步，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个强大的力量。要推翻它，只靠少数人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对内要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站在一起，对外要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国际友人站在一起。孙中山在临终的遗嘱中说：“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确是他一生奋斗中总结出来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为了要“唤起民众”，就要“联共”，就要“扶助农工”。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要“联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自然不是象有的人所说那样是什么一时的对策，恰恰相反，正是以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所得出的这两条根本经验为出发点的。

对中国近代化的内容，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也有了新的理解。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民主政治和工业化。对民主政治，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他强调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什么是“节制资本”？他作了这样的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

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针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原则，作为“平均地权”的补充。显然，经过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的新的三民主义，已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原有模式，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的共同的政治纲领。

* * *

孙中山一生走过的道路，代表了整整一代中国先进分子为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惨境遇，为实现中国近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孙中山是一个有着世界眼光、有着火一样热情的伟大爱国者。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比较完整的设计。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概括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历史要求。这些都帮助中国人民打开了眼界，鼓起了奋发前进的热情和勇气。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理所当然地成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一面鲜明旗帜。

在他一生的探索中，如何处理政治变革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始终。事实反复教育了他：在旧中国那种历史条件下，不经过彻底的革命，不先把“地底”的“陈土”挖除，近代化的高楼大厦是建立不起来的，任何美好的设想都会化作泡影。孙中山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革命中渡过的。这不是出于他对革命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更不是一种任意的选择，而是从他经历的无数次痛苦失败中得出的结论。这个经验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很可宝贵的。

孙中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始终深信，一旦人民在经过长期奋斗后掌握了政权，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将不是很慢，而是可以

计日程功。尽管革命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但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说，革命并不是目的，仍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为未来的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在这位可敬的爱国者的胸中，始终燃烧着对中国近代化未来的执着的憧憬和追求。中国人民把自己看作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许多美好的设想，在当时虽无法实现，在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今天，却成为中国人民一宗重要的遗产。

自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着人们思想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时代和国情，使孙中山有可能提出超越前人的新思想；而历史条件的不成熟性，又必然给他的思想带来许多不准确、不严格、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地方。这正表现出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提供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提供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十年了！他的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而时代是继续前进的。今天，中国人民在民族独立、民主、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等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大大超过当年孙先生的设想，正在朝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但是，先行者的历史功绩毕竟是不容遗忘的，而他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中仍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汲取和借鉴，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清军的装备与训练

茅海建

军队是掌握武器装备的集团。近代战争，一般的说来，不再表现为肉身相搏，而是人使用武器装备来对抗。人的力量通过其掌握的武器发挥出来。随着科学的进步，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武器装备也不断地得到更新改良。武器装备在近代战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武器装备的威力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这就需要训练。训练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使用武器装备的技能和尽可能发挥自己装备效力的战术。训练不严，利器亦不能尽其用。

本文旨在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装备与训练的一般状况，及其与近代战争要求的差距。

装备一 战船

清军设有水师，分布沿海各省。以闽、粤最强，江、浙次之，北方数省最弱。这种水师的布防状况的形成是由于：一，清入关后海上用兵情况（郑成功抗清及康熙收复台湾）；二，海禁之后（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的海盗分布情况。雍正之后，清水师的主要职责为缉盗查私。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水师战船有如黄爵滋所奏：

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巡洋缉盗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于缉捕则有余，用于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①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二。